

片场·视线

《好东西》：用脱口秀方式打开一部电影

■本报记者 柳青

电影《好东西》里，女邻居小叶不能理解单亲妈妈王铁梅为啥要和她乐队里的鼓手小驴约会，她看不上小驴，但王铁梅告诉她：“能让你自己开心的就是好东西。”其实，王铁梅并没有把幼稚的小马当作可持续交往对象，她把他们的关系定义为“课间10分钟的愉快”。

有人赞美《好东西》，有人则不，那么，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概相当于小马在王铁梅生活里的地位：能让自己开心一会儿，虽然只是课间10分钟的调剂。

导演邵艺辉把上海形容为“女性友好城市”，《好东西》的上海何止是“女性友好”，电影里那片梧桐树覆盖的街区是小姑娘和大姑娘的理想“娃娃屋”：男人们很有自知之明地充当“女人的工具”，他们在饭桌上像开屏孔雀一样大搞“雄竞”，10岁、20岁和40岁的女性相亲相爱，妈妈可以是女儿，女儿可以是妈妈，妈妈可以是朋友，朋友可以是妈妈，就连来自过往原生家庭的、来自糟糕亲密关系的伤痕，都是为了到这个理想的“娃娃屋”里被疗愈的。

这样的《好东西》是不是生活相对富足的城市女性的“小甜水”？是不是段子和金

句比人物更生动？是不是电影充当了脱口秀的容器，于是视听表达“乱来”？如果电影里的“前夫哥”是女权表演艺术家，《好东西》本身是不是女权商品？即便以上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也不能否认它让许多观众、尤其是女观众开心了一会儿，这一条顶一万条——它可以不上“好电影”，但还是被认可成“好东西”。

创办了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的老导演斯科塔·加夫拉斯说过：电影的成功总是和观众的渴望相关。《好东西》公映后的首周末票房1.6亿元，它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制造的声音远远超过它的票房实绩。对照年初的“国民闺女”贾玲导演的《热辣滚烫》、《好东西》的观众基本盘是有局限的。不过，《好东西》不惧怕“脱离群众”和“不接地气”，它是以此作为身份辨识的。这个大城市里的“女性神话”或“女性童话”，属于那些能在生活中随时接触到《那不勒斯四部曲》、泰勒·斯威夫特、伍迪·艾伦和阿瑟·米勒的观众，这部分人群，特别是这群人中的女观众，已经为了“主流电影讨好女性”苦恼太久。在《好东西》的发生地上海，过去的两三年里，剧场里上演过讨论女性生育意愿的音乐剧《不好意思！生不生娃让我好好想一想》，

驻场演出的亲密小剧场《好运日记》大胆分享夹在“被催生”和“自我意志”之间的女性为何主动选择“辅助生殖”，更不要说小众的青年戏剧创作领域的《杂食物》《做家务女子的雕像》在有限范围内引发过热烈讨论。戏剧工作者公然在舞台上开辟出一块“姐妹淘”的交流场，而作为“大宗商品”的电影，在这个方向上滞后太多。《好东西》引发群体狂欢，未必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在华语电影里，这样的东西实在很少，也来得太迟。

前夫哥一脸诚恳地说出“我为你去结婚”，女观众笑了；小马委屈地冲着王铁梅大吼“我把你拉黑了”，女观众笑了；前夫哥和小马的饭桌“雄竞”以小马被脱掉上衣、露出八块腹肌的闹剧收场时，女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自第一场映后，这些“梗”脱离了前夫哥和小马这些人物，脱离了它们发生的情境，仅仅作为金句和名场面流传开去。电影院里很快出现了二刷、三刷的观众，甚至在还没有公映时，点映场里就出现了年轻观众们忍不住“抢答”电影里的出圈“梗”，此起彼伏的“金句接龙”宛如立体声回响。这样的观影现场，像极了偶像男团女团的表演现场——男团女团的舞蹈并不追求对音乐的有效演绎，那些动作不承担意义，但是能

烘托情绪，并且易于复制，能让粉丝们踊跃“翻跳”。《好东西》不也是这样一种很特立独行的非典型电影吗？叙事电影里遵循的古典戏剧结构和人物塑造，在这里让位给观点和姿态的表达，小女孩王茉莉朗读作文“我还是喜欢做观众”，“六边形妈妈”王铁梅教育女儿“正直勇敢有阅读量”，小叶告诉王茉莉“小男孩很好玩儿的”……在这些瞬间，情绪就是剧情，情绪比情节更能调度观众的感情，这可不就是小叶讲给小驴听的励志总结：“等你长大了，会有新的游戏规则”。《好东西》何尝不是跃跃欲试地在建立商业电影新的游戏规则。

论“接地气”，有和《好东西》同天公映的《风流一代》，在贾樟柯累积了20多年的画面里，中国女性在公共生活中的缺席触目惊心，风流一代的江湖女儿老去以后在大同的城墙下夜跑，这样黯然的现实大抵没法让人“开心起来”。论“视听语言优越”，文德斯导演的《完美的一天》遭遇“影展和公映两重天”，影展放映一票难求，公映时门可罗雀，甚至，连赞美《完美的一天》都要自省是不是“被欧洲白人男性的审美规训太久”。于是，对照老一辈男导演《完美的一天》和《风流一代》力不从心的票房，能吸引观众回到电影院的《好东西》还真真是好东西了。



电影《好东西》海报。

■本报记者 王彦

小院里挂起香肠，从此蛇瓜只存于心照不宣的调侃，人们哼着歌干着活，在新年里说亲情友情爱情都要“百年好合”的吉祥话。

《小巷人家》剧终了。40集的长剧在今天算是稀罕又奢侈的，可观众说“戒断反应开始”，江南小巷的家长里短邻里情、时代浪潮下有播种有风雨有收获的同甘共苦，让人们直呼幸福，嚷嚷着“还想再看100集”。

观众爱小巷，因为它不仅是部电视剧，还是一幅展现社会变迁、家庭温情、邻里和睦的时光画卷。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生活里缓过片刻，随故事去感受时间在柴米油盐里静静流淌却又波澜壮阔，那是过去三四十年来中国人熟悉的发展图景，也是始终刻在我们民族基因里的对真善美、对人情味的看重。而成就这些的，有剧作者对时间和生活的细腻体察，有制作团队较真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还有一众好演员把表演当成了手艺活，用成熟的技术调度丰富的人生经验，真切的生活滋养了恰如其分的表演。

我们对话“小巷中人”。他们未必在乎戏份多少，也不纠结戏剧张力是否拉满，人设是否足够讨喜，他们信奉“表演是艺术”“没有生活，没有好演员”。聆听演员们对角色、对表演的认知，就会理解，为什么他们能把人情滋

味填满时光的褶皱。

蒋欣：找寻“最像我的宋莹”

《小巷人家》的主要角色里，宋莹第一个出场。那个听着同事抱怨在宿舍里养孩子，直接把小栋暂放在书记家的麻辣厂花，在开篇就让全剧活泛了起来。

网友说，精神不内耗、善良又有锋芒的宋莹看得人心旷神怡、嘴角上扬。蒋欣自己在采访里数度确认：“演过的角色里，宋莹跟我最像。张开宙导演拿到剧本就说，有个角色简直就是你。”

但塑造人物，并不只靠喜欢或相像就能成功，蒋欣有个寻找的过程。

宋莹是苏州人。开机前，蒋欣每天在房间里放评弹，不求复制唱腔，只因在背景音乐里接近吴侬软语的气质。宋莹不避讳谈钱谈利益，年代剧里少见的理直气壮落在表演者眼里，一面是人物“心直口快，特别愿意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性格使然，另一面是她对劳动应有的价值认同。

《小巷人家》剧终，好演员再次示范了生活与表演的交融

他们用表演把人情滋味填满时光的褶皱

生活环境、性格底色、价值观都有了，厂花的生长就有了根。剧集前期，宋莹在小院里边干活边回忆刚进厂时生产大练兵的情形，兴之所至张口一段《紫竹调》；剧情后期，黄玲下岗，远在广州的宋莹隔空出主意让玲姐拿厂里抵算工资的布匹到市场上售卖，林武峰刚出声质疑，妻子的抢白一秒都没耽搁，“我们厂可是江苏省优秀轻工企业代表”。对工作的热情、对黄玲的关切、对工厂的归属感，被蒋欣悉数融进鲜活的肢体语言。网友评价，如此可爱不做作的角色，活该有好命。

曾有人说，演外放的辣妹子，蒋欣是轻车熟路，演员的长相天然带着明艳感。可在她本人看来，角色能被观众记住，很大原因是一些看似不讨喜的人物身上有着可理解之同情，“人物作为立体而真实，因为真实了才能与观众接通情感”。演蒋欣饰演的宋莹，她说导演演人物内心逻辑应该是认定自己喜欢自己才到哥哥家来，因为自以为被爱，角色临死时的那声嗝才引人唏嘘。而到了

《欢乐颂》，蒋欣不喜欢樊胜美的物质，但她演出了一个被原生家庭拖累的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的女性的不易。

之于宋莹，她是小院里一直护着黄玲的闺蜜，也是小家里被丈夫捧在手心的妻子。人物的被宠爱和傲娇是显而易见的，蒋欣还想找寻些“外表下的柔软，还有她作为女人的可爱”。为争取分房名额，宋莹和陆科长大吵一架，蒋欣和导演沟通能否加个镜头，因为直觉实在委屈。成片的画面里，宋莹挤出人群，上一秒人前的张扬在无人注意的角落溃败下来，观众在第一集就狠狠共情了。

让人念念不忘的名场面，还数宋莹告别黄玲的那次。小院里，两人执手难言别离，宋莹拉着黄玲，“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说着还晃了几下头。小女生般撒娇的说辞和模样，出自蒋欣即兴发挥。“那话意味着宋莹内心有点崩了，在交通、通讯都还不发达的年代，谁都不知道一别之后再何时见。”演员记得片场的细节，蒋欣搂着闺蜜，剧本里没有的台词就冒出来了，“妮儿姐也很感动，接过话头‘我答应你’”。那一刻，演员的相互支撑成就了剧中人的良善相依。

闫妮：有一种女性力量，叫“静水流深”

杀青那天，闫妮泪崩了：“我那么不舍得黄玲。”虽然刚开始，她和观众一样会冒出些为什么。“但演得越深入，越会感受到人物魅力。”

初见黄玲，身上有负重前行的隐忍感。纺织女工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年轻时没谈过轰轰烈烈的自由恋爱，为人妻为人母后，要跟丈夫承担“长媳”的责任。按年代剧的惯性走向，如此人物多少会有苦大仇深的色彩。可闫妮觉得，这是最初的误解。她提到老话“不痴不聋不作家翁”，黄玲深得个中精髓，如静水流深，温柔沉静里蕴藏能量，也有几分生活里的大智慧，何时睁只眼闭只眼、何时据理力争，其实内心不含糊。

公婆老想把小儿子家的负担转移给庄超英，黄玲宁可离婚也寸步不让；庄家年夜饭没让她和女儿上桌，她平静地带着筱婷在灶台边吃。“因为她知道小孩子其实不在意不上桌，只要跟妈妈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而且可能没有束缚更快活。”

黄玲相信真心换真心，她待夫家的外甥向鹏飞如己出，后来鹏飞开上自己买来的客车，头一个就想着带大舅妈兜一圈。邻居老吴再婚，重组家庭里不受待见的珊珊弟弟没少受黄玲和宋莹的帮衬，可长大的珊珊得寸进尺，黄玲及时止损说了“不”。在闫妮看来，黄玲身上有超越时代的特质，那是一种女性力量，叫作“静水流深”。就像筱婷打算随林栋哲去南方找工作那回，父母强烈反对，争吵中，庄超英怒斥女儿“不自尊自爱”。观众对这一幕的反馈读懂了自己身边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这何尝不是好事。“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一面镜子，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能让人看清自己、审视自己。好的继续保持，不足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尤其当时代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转变，电视剧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呈现从现实到理想、过去到现在的落差，恰恰能缝合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

和妻子程莉莎一起追剧时，他会被对号入座地吐槽：“你看你就这样。”但转念一想，假如每个家庭都能在《小巷人家》里看到日常的影子，从剧中人直到网络观众的反饋里读懂自己身边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这何尝不是好事。“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一面镜子，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能让人看清自己、审视自己。好的继续保持，不足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尤其当时代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转变，电视剧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呈现从现实到理想、过去到现在的落差，恰恰能缝合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

也像音乐的篇章，有起有落”。又好比黄玲去婆婆家要钱，过程不算愉快，但目标达成。回到厨房做饭，闫妮把一场打鸡蛋的戏演得微妙不已，“庄超英在旁边站着，我‘啪’一下打碎鸡蛋，又‘啪’一下，让这个节奏打进超英的心里，告诉他‘以卵击石’我也要击”。

刚接到《小巷人家》剧本邀约时，闫妮对制片人侯鸿亮、导演张开宙讲过她的表演观：“黄玲呈现出来的状态是很生活的，但我们要提炼生活，我希望黄玲能演出‘提炼了的生活’。”后来，她在网上看到观众解读，黄玲是站在传统和现代转型期的女性，她是自己的高山，也是孩子们柴米油盐中的启蒙者。闫妮觉得：“当时的探讨是有效的。”

郭晓东：“孝庄”是镜子，也是观众的认可

几乎没有异议，郭晓东饰演的庄超英是全剧挨骂最多的角色。

继《新结婚时代》的何建国后，这是郭晓东再一次饰演一个与当下语境、尤其是女性观众的心理期待背道而驰的角色。人设不讨喜，郭晓东不介意。在他看来，角色的好恶是观众的自由，但演员表演，在乎的应该是人物的可信度、层次感，“只要这个人够丰满，有个性，或是有厚度，我都愿意去演。我自己希望能够演一个比较复杂的角色”。

剧播期间，窝囊愚孝的庄超英被网友戏称“孝庄”。一方面，身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参与高考阅卷的老师，庄超英重视教育，无偿为小巷的孩子们辅导功课，受人尊重；另一方面，他对父母无条件服从，却让妻子儿女委曲求全，在剧外承担了颇多骂名。又被“骂”上热搜，郭晓东坦然接受，还在微博认领了表情包，调侃自己在“窝里横”赛道越来越稳：“这是对我演技的认可。”玩笑之余，他说自己深入剖析过角色：“你说他愚孝，但中国人推崇的一句话‘百善孝为先’，难道孝有错吗？”他承认，生活中包括自己，有时存在无条件的“孝”，也在庄超英之后的人物成长弧线一样，在漫长的人生中，从点滴量变累积到了质变，在某个瞬间幡然醒悟，开始朝着更好的自己转变。

回到最初，郭晓东不讳言，读剧本时看到了似曾相识的面孔，仿佛照镜子：“我曾经也有点拎不清，不擅长处理一些关系。”相似的情感投射，既源于部分重叠的生活轨迹，也和长久以来流传的传统家庭观念有关。“可能不少男同胞在这一点上都有点迟钝，有点儿辨别不清晰。”郭晓东说，电视剧总是被人们称为生活的影像册，它确实可以承担描摹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

和妻子程莉莎一起追剧时，他会被对号入座地吐槽：“你看你就这样。”但转念一想，假如每个家庭都能在《小巷人家》里看到日常的影子，从剧中人直到网络观众的反饋里读懂自己身边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这何尝不是好事。“好的文艺作品应该是一面镜子，有对社会的责任感，能让人看清自己、审视自己。好的继续保持，不足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尤其当时代在进步，人的观念在转变，电视剧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呈现从现实到理想、过去到现在的落差，恰恰能缝合现实、反映现实的功能。

李光洁：“人间理想型”其实从人间烟火来

在女性美好情谊的故事架构里，林

武峰的出场时间没有绝对优势。但从开播到剧终，“林工就是人间理想型”的话题始终高热，“拥有林工”成为剧终时分的美好祝福。

“人间理想型”好在哪儿？李光洁眼里，林武峰有格局、有担当。他为人物的爱妻之策提炼出九字箴言“一搭手、二搭话、三兜底”，就是眼里有活，事事回应。许多时候，他站在宋莹身边，递个热水袋、披一件外套，在物质条件不算富裕的时候用50斤粮票为妻子凑买电视的钱，然后扒着爱人的肩头说“你高兴，是咱们家最大的事”。

在演员看来，林武峰的教育观、持家之道其实归根结底两个字“允许”，“允许他的爱人和孩子都做自己”。

人设虽好，但没看过天抢地的情绪风暴，也没有所谓人性的灰度供演员发挥，从理想的人设到理想的演绎，李光洁很透彻，“人间理想型其实要从人间烟火里来”。塑造林武峰，他从自己的父亲和导演张开宙身上看到了人物的影子。

李光洁生于上世纪80年代：“林武峰给小莹装了个水池子，那材质我一看，水磨石，就是我小时候用过的。”靠谱的团队建立起时光隧道，演员第一次置身片场就被召唤出了个体记忆，“我在煤矿厂大院长大，上子弟小学，父亲是工程师，和母亲很恩爱”。

儿时日子如今细说起来，涌现的有人生大事。比如煤矿大院长大的孩子想去北京艺考，父亲其实无法预知未来，只是多给了孩子一段思考时间，“你确定要学这个？”得到确认后，父亲投了赞成票。更多时候，童年光影留下的是些细枝末节，院里的马扎、夏天的冰棍、手电筒暖黄的光束、妈妈吹风机的声响，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家人……这和人们观剧的感受何其契合——栩栩如生又不动声色。

李光洁说，剧本固然提供了极其扎实的基础，但到了具象情境中，导演带着演员们二度创作，好演员们相互碰撞，会有规定情境之上的火花闪现。宋莹和庄超英早就嚷嚷来补课的学生吵架，原剧本没林武峰的事儿。但演员觉得那样不符合人设，“他要在宋莹身边的，所以我拿了件衣服披在宋莹身上”。邻里间的排水问题棘手，宋莹气得不轻，剧本里介绍了林武峰一句话宽慰宋莹，但具体说了什么得靠演员发挥。现场一句耳语，“这事儿交给我，放心”。宽慰了妻子的情绪，捋顺了事事兜底的人物逻辑。还有宋莹夫妻坐在床边泡脚，也是剧本笔墨不及的细节。李光洁说：“感情好的人就会同频，这是生活教给我们的。”

其实拍摄的过程并不一帆风顺，中途，李光洁的父亲突然身体抱恙，需要手术。他试着向导演请假，本没抱太大希望，毕竟剧集拍摄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想，张开宙没有任何犹豫。大家都说“戏比天大”，他对李光洁讲“家人比戏重要”。那刻，演员从导演身上看到了林武峰该有的从容与宽厚。

“林工身上有他所代表的时代性，但人物表达的情感是没有时代局限的。我们能站在今天的坐标去触摸年代剧里人物的内心，归根结底，情感不过时，生活的真谛没有变。”通过跨时空的情感连接，让观众一同入戏，这也就是《小巷人家》在做的事情。李光洁说：“有多久了，我们没和家人一起围着看同一部剧。《小巷人家》可以实现，那也是我们做演员的成就感。”



它不仅是部电视剧，还是一幅展现社会变迁、家庭温情、邻里和睦的时光画卷。我们对话“小巷中人”，他们未必在乎戏份多少，也不纠结戏剧张力是否拉满，人设是否足够讨喜，他们信奉“表演是艺术”“没有生活，没有好演员”。



制图：张继